

三位平凡而伟大的奶奶

文/邓明

我的爷爷邓乾元是革命烈士，生于1904年5月，湖南省溆浦县新坪乡车头村人，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曾积极投身学运、农运、工运和创建革命根据地等革命工作，他的照片如今还摆放在长沙烈士公园烈士纪念馆中。

但今天，我想说说我的三位奶奶。

我的张绍英奶奶，生于1901年，湖南溆浦县水东乡人，经人保媒介绍与我爷爷结婚。但我爷爷反对这门亲事，曾祖父扬言要断了爷爷读书的一切费用，最终拜了堂。

结婚第二天，爷爷对绍英奶奶说：“我要出远门，可能再也回不来，你不要等我，找个好人家再嫁吧。”说完就离开家，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。

1925年，爷爷在常德省立第二师范领导学生闹学潮，引起了反动派的注意，溆浦要抓捕绍英奶奶和我的曾祖父。

后来，因为绍英奶奶对我爷爷的事确实一概不知，乡绅保释，曾祖父和我奶奶才出狱。

1939年，我的父亲邓梦莲被接回溆浦，一直由绍英奶奶抚养。1947年，我父亲参加革命离开了溆浦，绍英奶奶去了庵堂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党和政府寻找邓乾元烈士的家属认领烈士证，才把绍英奶奶从庵堂接回，享受烈士家属待遇。为了等我爷爷回来和照顾我父亲，绍英奶奶一辈子孑然一身。

我的董彩云奶奶，是早期共青团员，湖南衡阳人。马日事变后，她被安排做地下交通员。恰好我爷爷当时来到长沙，彩云奶奶与他进行联络，后报组织批准结为了夫妻。

秋收起义时，我爷爷与彩云奶奶分别时约定，今后也许只能在梦里相见，生下的孩子不论是男是女，都取名为梦莲，愿他（她）像莲花一样无瑕。

一次革命活动中，彩云奶奶不幸被捕，因被查证是邓乾元的夫人，反动派对彩云奶奶说，只要声明与邓乾元脱离关系，就可以被释放，但彩云奶奶坚决不从。

1929年，彩云奶奶因即将生产，从狱中被保出分娩。我爷爷当时在罗霄山脉一带组织革命活动，彩云奶奶生下父亲后只身去井冈山寻找爷爷，从此不知下落。

我的董彩霞奶奶，是彩云奶奶的亲妹妹，因姐妹俩被反动派通缉，彩云奶奶将襁褓里的孩子交予彩霞奶奶手上时说：“一定要把他养大成大。”

彩霞奶奶说：“我就是拼了这条命，也要保住这孩子。”

说完后，两姐妹抱头痛哭。

后来，彩霞奶奶带着我父亲隐姓埋名，靠帮别人洗衣度日。

1930年，彩霞奶奶听说红军在《告长沙市民书》上有邓乾元的签名，即刻带着只有15个月大的我的父亲赶到长沙，想让爷爷能见上父亲一面，可还是错过了。

彩霞奶奶艰难地把父亲养到了10岁，因生活窘迫万般无奈给曾祖父写信，父亲才得以被接回溆浦老家。为了把烈士没有谋面的孩子抚养成人，彩霞奶奶一辈子都没有嫁人。解放后，彩霞奶奶没有给组织上提任何要求。

三位平凡女子，她们用自己的方式，为党的事业奋不顾身。绍英奶奶用一生等待爷爷，彩云奶奶16岁开始投身革命，彩霞奶奶为一句承诺终身未嫁，她们的故事平凡，但她们都是伟大的。此刻，我已泪满衣襟。

夏夜昙花

文/邓亚兰

在我的记忆深处一直都有一株昙花，那是开在我家老院子里的，是开在那永远也回不去的夏夜里的昙花。

我家的老房子，前面的正房住着舅舅一家，后面的偏房住着我和外婆一家。一个不大的院子，原来还有个院门，后来政府扩路，就把院门拆了，后退了一点，就变成了没有院墙、没有院门的开放式院子。这样的院子，母亲和舅舅各自侍弄着。母亲靠东边栽了几盆花，是些什么不记得了，但是那一盆昙花，我却至今未忘。

县城的夏天是没有电风扇的，每户人家都会有一个竹床。晚饭后，家里的劳动力就会把竹床搬出来，用清亮的井水淋了个透，再用软布抹干了水。家里人就三三两两地坐上去，年长的坐中间，年幼的坐两头。也不知道那竹床能坐多少人，反正一家子都在上面，也不觉得热。年长的手上都拿着蒲扇，一刻不停地摇竹床就“叽叽呀呀”响。老太爷子是独尊一份的，嘴里天南海北，聊着家长里短；年幼的忽上忽下，一个人享受着一个竹躺椅，摇着蒲扇或者油纸扇，闭目养神，等着媳妇们端来了冰好了的西瓜，才会睁开眼。那井水冰过了的西瓜清亮爽口，没有牙口的老太太、老爷子也是吃得美滋滋的，很是满足。

晚上八九点钟的样子，母亲就会提醒我们去看昙花，我们几个小孩就会打着手电筒守在花盆边等着昙花开放。“哦，开了开了！”随着我们的一声欢呼，昙花在夏夜里开放了。昙花那圆筒形的主枝，便呈放射状，叶片墨绿肥厚，纤细的枝干上挂着垂首含苞的花骨朵。昙花的花骨朵高挑纤细，好像穿长筒裙的少女，花筒慢慢翘起，紫色的外衣慢慢打开，雪白的花瓣从花托中间轻轻地探了出来，一片、两片、三片……接着成束成束的金黄色花蕊栩栩挺立，中间一根柱状雄蕊高高翘起……花瓣层层地分开来，开成一朵圆形的大白花。

我们那时候太闹，没有静听花开的声音，但每一朵竞相开放之时，我们都会欢呼，啪啪，一朵接着一朵，那紫色筒裙似的花托包裹着洁白的花朵和黄色的花蕊，黄白相映，条条缕缕的昙花瓣末梢微微外翻，挂满了晶莹的水珠，也轻轻地颤抖着，冰肌玉骨、楚楚动人！全然绽放时，它通体如凝脂，似乎每一缕花魂都存满了玉华。一阵微风吹过，花朵儿微微颤动着，悄悄地散发着一阵沁人心脾的馨香。我们一个个都吸着鼻子，仿佛要把这馨香都吸到肺里去，留着心里边。溶溶月夜下，昙花有着出尘的洁白及清丽，仿佛飘着薄薄轻纱，似梦似幻，宛如仙子。整个花儿淋漓尽致地全部绽放时，全株微微振动，清雅幽香萦绕，且香随夜渐浓。我们几个孩儿在这花香中昏昏欲睡，也不知道它何时就凋谢了。

古人留下昙花的诗歌并不多，只有一首我很喜爱的：“一茎数蕊尽丛生，粉晕檀心画不成。静态雪花堪比洁，幽香莲叶与同清。”昙花是所有花中生命最短的，短暂得仿佛只有一瞬，就好像划过天际的流星，那一瞬灿烂无比，一旦凋零就不留一丝曾经存活的痕迹。

由此可想，大千世界中，真正能让人动心的美丽，莫过于昙花一现般的瞬间。昙花无言，却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，告知了世人一个颇深的道理：再美丽的花也会凋谢，再绚丽的人生也会谢灭，再貌似强大的生命最终也会完结！昙花这花中隐者、圣者就这般地默默无语着，用自己生命的代价，为我们这些在风尘中忙碌的人，诠释了美好、奉献、高尚的全部意义，诠释了生命整个过程的意义！



最是难舍旧书桌

文/刘诚龙

这张书桌，随我三十来年了。这张书桌摆在我旧居卧室，我进去，一眼望见，如见初恋。

这套位居一所学校的旧房。旧房物什多半没了，人去房空，想带走的，是安置在卧室的书桌。书桌很旧了，本来漆的老红色，红色越发老了，老得如褐色，中间开裂，裂缝有点大，放炮线一样宽。裂缝人所不喜，我却挺爱。

算下来，家已搬过五六七八次，每次都有旧器，随了岁月东流去，书桌一直与我不离不弃。堂客每到新家，她要好好安置的器物是饭桌，饭桌定位了，堂客让诸物归位。我心心念念的，是书桌。新婚婚房，是在一所小学，房子很小，三间，直线排列，客厅兼饭厅，中间是卧室，卧室后杂屋。家无杂物，便把书桌安之。杂屋临一条小河，对门是广阔的农村，书桌与我，我与书，便大有作为。伏桌倦了，起身，瞭望山头，瞭望山头苍翠之草木；俯视田畴，俯视田畴之稻花。书桌之上，寄寓过一段长长短短的岁月。

后来搬家到县城，我喜滋滋地搬第一物件，便是书桌。后来又搬了家，四周皆楼房，套间与套间的空隙处，有棵梧桐树，梧桐更兼细雨，这次第，欢喜了得日子。一桌、一椅、一书，在书桌上，消磨过人生。

到了现在所居的城市，楼更多了，房更密了，可视野更窄了。人家的世界是越来越广大了，我的天空是越来越内卷了。你是三千世界，我是三平书房。

书桌摆在临窗位置，面对的是操场。操场上奔跑着的小学生，他们的脸红扑扑的，他们的脚步泼泼的，坐在书桌上，打开窗帘，所见都是跳跃的童年，看到他们，向老之人，也有了少年心。世界大与小，辩证法存焉，眼中世界越大，书中世界越小；眼中世界越小，书中世界越大，你想得眼，眼里世界就大，你想得书，书里世界便大。

恋旧，不一定是老了之故。我恋恋书桌，是与书桌有情缘。我堂客说，她须在自家旧床上，才安然入眠，纵或广厦千间，华居万物，她也睡不着。偶尔写作，换了其他桌子，字词语句，都蹦不上脑来；到了这张旧书桌上，词语如故乡小河，泉水叮咚响。虽然词语是小词语，虽然心情是小心情，虽然文章是小文章，到底能风行水上，意能跳来纸上。

这书桌，是我要结婚时，我姐夫与妹夫替我量身打造的。结婚那会，家无资，老爹去山头，砍来榿树。榿树木质细腻、紧板、沉重、厚实。老爹省钱，恰好姐夫与妹夫是木匠，喊来他俩，坎坎伐榿，当刨木，他俩是蛮用心的，最亲的人嘛，不用钱，也用心。书桌很重，若抬，要两个汉子，咬起牙齿劲，方可搬动。再咬牙齿劲，这书桌，我都搬做我随身物件。很多人，走着走着就散了，散了，不想相聚了；很多物，用着用着就丢了，丢了，不想再去牵挂了。很多事情是，真没道理。旧居都想抛弃了，无甚眷恋；书桌当遗弃了，心生眷恋。

再搬新家，书桌没搬过来，让书桌留守旧居，书桌会心伤不？桌犹如此，人何以堪？书桌沉静无言，怨与不怨，我都不知。就好像与爱人，也会小别。与书桌别，与书没别；在我新居，电脑桌上展书而读，偶起情思，想起旧居书桌，便在散步时候，潜意识去学校，拂拭书桌。

旧居，准备处理了。书桌留不留？留。待退休，回老家安顿身心，其他物品，都不搬了，就把书桌搬回老家。书桌回到最初地，当算得其所哉，恰如我来自故乡，回归故乡，书桌与人，都是归其根处。